



逃犯条例 深度

未成年抗争：他们最漫长的暑假

他们十五、六岁，走上街头，也将朋辈、父母、老师、校长带动起来。这个暑假，“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

端传媒 特约记者洪蔼婷 发自香港 | 2019-08-16



安琪与母亲。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白灵16岁，她穿黑衣，整个夏天从手机和电视读著反修例运动的消息，但大部分时间她并没有在现场，即使在现场，她也是选择后退的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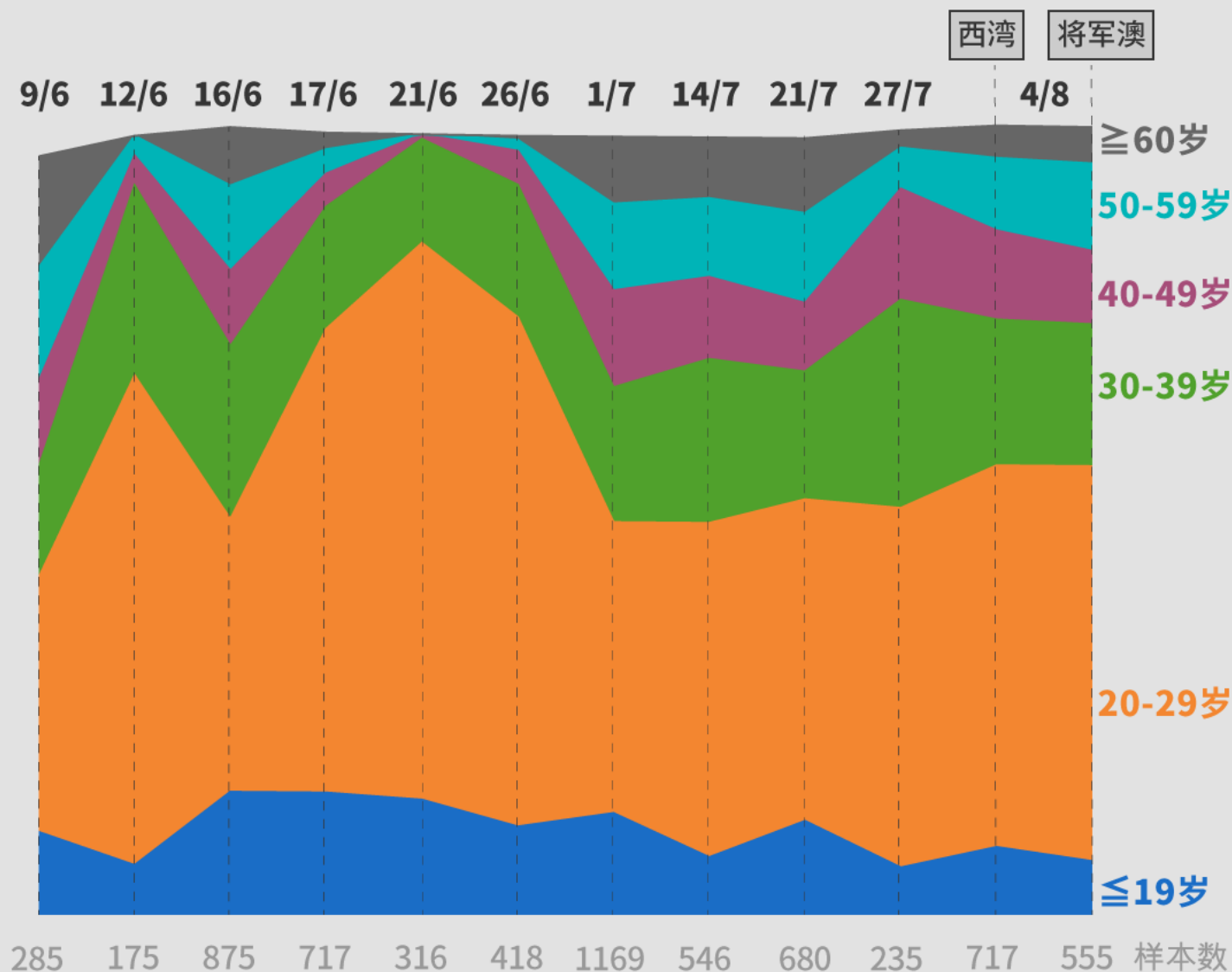
她妈妈是位清洁工，有时白灵帮她在公屋拾垃圾，这成了她唯一能在运动里奉献的技能。她自觉自己是一个站得远远的温和群众，寻找著一种安全又合适的参与方式。“这种抗争是长期的，厌恶性工作没什么人想做，就我来做吧。”

这场盛夏运动，从六月、七月、八月至今，遍地开花，经历了不同阶段，不断刷新人们认知的除了运动本身的能量和型态以外，还有街头示威者的年龄——大学生固然不少，但还有许许多多一看就是中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冲在前线，但似乎更多的选择站在后头。在十五六岁的年龄，他们大胆又小心的尝试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处理著和校园，和家庭的紧张关系。

要说有多少学生参与这次的反修例运动，目前并无准确统计，但可以从香港中文大学在每次示威现场的调查里，看见人数比例。根据[《“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注），整场运动的参与者年龄主要介乎20岁至30岁，19岁以下者参与游行较多，后来运动自从7月21日元朗事件后，转向各区流动示威后，19岁以下者的参与比例也明显下降。

至于示威者的政治光谱，总括来说运动参与者以温和民主派为中坚力量，其次是广义的“本土派”。调查结果显示一个明显的划分时期：7月27日在元朗举行的反暴力游行前，温和民主派与本土派所占比例一直大约是4:2，自从7月27日起，温和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参与者已是各占约三成。

参与反修例运动的市民， 哪个年龄层较多？



注：报告原始数据为「比例」（%）非「人数」。

数据来源：《「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香港中大民调中心

参与反修例运动的市民，哪个年龄层较多？图：端传媒设计部

从一条条例，引发对一个政权或威权管治方式的抗拒，那抗拒不是突如其来。抗拒的脉络，从这群学生出生的2003年已经开始，他们童年的记忆里都是一宗宗“反”的事件，他们记得反双非、反国教、反水货客。各种“反”，发展到日常生活里，甚至成为伦理批判，有时成为“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之道德指标，仿佛他们愈能从日常里与中国内地和内地管治拉开一段距离，便愈忠诚于香港的独特。

当学校直面政治

“有些人游行完了就去喝喜茶。”朗的同学说。

“我从来不喝喜茶。”朗立刻澄清。

朗今年15岁，他读的中学有校友在运动之初参与了联署，但这不代表学校对学生采取开放态度。回到5月中旬，整场运动校友实名联署，一把将集体的团结推到街头上。全港有449间中学，联署的有349间，不过联署是联署，学校表态是一回事，学生表态又是另一回事。

朗在学校的内联网里发了一封电邮给全校师生，全校师生都读著这邮件，主旨写“明天一起推倒恶法”，内文说“修改《逃犯条例》最恐怖的，是可以引渡上大陆，并没有追溯期，极为影响香港东方之珠的美誉，以及国际地位。”翌日是6月9日，反修例的第一场百万游行，朗的同学有13个参加。



阿朗。摄：林振东/端传媒

校长起初对这件事情没有表示，他总是说“学校是政治中立的场所”。过了三天，11日，教协开记者会，宣布全港启动罢课，朗一些师兄师姐在内联网里，问学校罢不罢课，并且开始讨论如何参与反修例运动，突然间，整个内联网死掉，“网页无法显示”。六一二罢课过后，金钟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催泪弹放了150枚，接著运动被命为“暴动”后，学校的内联网重开了，校长面对师生的交代依然是，“学校是政治中立的场所。”（端传媒向学校查询相关事宜，截稿前未获回复。）

尽管网页只是被禁了几天而已，朗的一些同学们在讨论，“学校是不是在封锁我们的言论自由？”无论如何，这事情一方面显现校方的不知所措，一方面折射了作为学生，他们表达的权利某程度正被学校支配著。

朗后来开始向社区著手。他在网络论坛连登里认识了几个同区的中学生，十四、五个人开帖召开一场学生集会，本来时间地点都安排好，连新闻稿也写好，谁知这帖惹来批评，说集会要求学生穿校服出席，是没有顾及学生的安全。集会马上取消，朗在帖里道歉，自此他行事更小心了，特别是保障身份方面。

这十四、五个人后来成了区里的核心，运动流水般流落社区时，他们也在区里建起一道连依墙，晚上在旁边守护，叫著口号。

“老师”这个角色

朗的执著，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班主任的启蒙。

据朗的形容，他的班主任是位“男神”，不因外表，而是因为班主任在课堂内外总是有意无意谈起时政，他不谈特定立场，而是重在启发，比如他会突然问，“如果街头的示威者与警察的角色交换，你觉得情况会不一样吗？”



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冲击警察防线，引发警方清场，施放催泪弹。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此次反修例运动中，不同中学选择了和学生保持不同关系。有些学校尊重学生参与游行集会的权利，却又担心学生安全，于是安排了老师陪同学生去上街。朗和班主任没有这种安排，他们只是各自各上街，但游行过程里，两师生总在Facebook Inbox聊天，班主任用年轻的语言与朗交流著：“不要当冲冲仔呀！”得知西方记者来访问朗时，班主任取笑他说，“你扬威国际了！”这种陪伴，让朗感觉他在这场运动的参与权利还是自由的。

安琪今年16岁，她感觉自己在这场运动里是完全自由的，学校很开放，家庭也很开放。

612全港启动罢课时，正逢考试季节。罢课前一晚，安琪的学校在Whatsapp群组让所有家长，投票决定明天要罢课延考还是不罢课继续考试。安琪妈妈说，那些家长群组里的日常对话“通常政治洁癖”，免得立场不合，大家都识相在组里沉默。投票结果是考试顺延一天，投完了也没有人异议，家长们有默契地再次沉默。

学校安排了一个课室，成为临时的情绪辅导所，面对整场运动，若学生有什么困惑，可以到那辅导所找老师倾诉。而至于罢课的学生，可以到学校礼堂听分享会，分享的人包括，站在运动前线的同学、老师，以及毕了业读法律，回来解读《逃犯条例》的师姐。安琪说，礼堂几乎坐满八成座位。

安琪记得，有一位老师在台上分享他这次运动站到前线，他人生第一次站到前线，并且被身边的年轻人指责，“你不要在这里阻碍我们。”这老师后来因这指责反省，“一个社运里并不需要所有人都在前线冲，就算你不是当最热血的人，起码你选择了不当一个冷血的人。”

“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

安琪没有选择成为冷血的人，也没有成为热血的人，她选择后退，她选择冷静。

在安琪看来，政府修例最大的影响，是可能触碰香港司法独立的边界。7月1日那天，香港回归中国的第22个年头，安琪和妈妈下午一同在街头游行。两母女从反国教以来，几乎每场游行都出席。但她们的游行有个约定，天一黑就是警号，抵达金钟就是表达了诉求，就得离开，“安全最重要”。

7月1日走到金钟时，立法会外穿黑衣的人已经在撞玻璃，希望占领立法会。立法会外头的人那天像浪潮一样，一浪一浪传物资，“剪刀”、“剪刀”，一浪一浪传进立法会里。安琪妈妈的一位朋友这时候在人群里出现，逆著人群奔向她们两母女，要求她们留下来，“你们留下吧，你们留下吧，否则里面的小朋友没有人帮助了。”



2019年7月1日，立法会会议厅被示威者占领。摄：林振东/端传媒

安琪和妈妈没有留下，按约定离开。

母女回家看直播，那个晚上立法会的议事厅被涂鸦了，一个叫梁继平的黑衣人站上议事会桌上，脱下口罩说，“我们已经无法回头了。”

他们一家四口看完直播，准备各自回房间睡觉，安琪无法睡，她忍不住把心里的矛盾说出来：“我实在不想承认他们是暴徒，但他们在破坏区徽，他们在破坏香港的象征。”

于是一家人半夜穿著睡衣，坐在饭桌，来了一场“什么是暴力”的家庭会议。在这个夏天，他们有过不少类似的会议。

这个会议存在著两个世代、两种成长背景——安琪父母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七零年代出生的人，一个做会计，一个做银行，他们赶上香港回归前的经济起飞与知识开放，给予他们那代人如今的安定，有楼、有专业、有自由可以判断是非。他们忧虑安琪和哥哥这一代，未来将渐渐被迫至单一，“单一的新闻发布，什么都掩盖住，不能有丁点反对声音，从一个原本比较自由的思想，你要他们一下子去一个这样的社会，那么单一，自然是恐惧的。”安琪妈妈说。

在家庭会议上，爸爸问安琪：“戴著口罩的他们毁坏的是物件，比起整个政府、或是整个制度的崩坏，你觉得哪个更重要？”

哥哥也加入其中，他说他觉得这是一场空城计，“为什么突然间没有警力了？为什么这场破坏能够发生？”

临睡前，一家人对于“暴不暴徒”没有定论，但起码情绪隔著直播画面，再隔著一场讨论，冷静了不少。安琪妈妈说笑，“好在我们政治立场一致，不然会打架。”这家庭会议可贵于聆听与讨论，试著梳理各人的纠结，“一起成长吧，整个家庭。”

那晚以后，第22个年头的7月1日以后，醒来的香港进一步面对难以拆解的困局，三方势力持续在蔓延：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冷漠和回避；警民之间不断上升的冲突，警方大量施放催

泪弹、橡胶子弹、海棉弹，武力无间断地升级；而从元朗的白衣人至北角的红衫军，涉黑的力量也在蔓延。

群众除了寻找面对这个困局的方式，还寻找著梳理自己内在的路径。安琪家里的会议因此而更加频密，安琪说，“正所谓闲话家常”，运动和公共议题已经成为他们家饭桌上随便一道菜。

后来，安琪又试著把这种对话方式发展到学校里去。“我又胆小，又怕催泪弹，又怕受伤，总之怕很多事情，我想不是每个人的性格都适合冲的。如果说这场运动我做得比较多的，应该是学校，我试著用冷静的方式，与身边那些政治冷感的同学，心平气和地展开对话——如果我跟你们聊《逃犯条例》，你们不介意吧？”



2019年8月5日，金钟警察展开清场行动。摄：陈焯輝/端传媒

“我看见背后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一般来说，安琪以“关心时事”与“不关心时事”辨别她对话的对象，这可以从他们的Instagram内容和日常谈话里轻易分辨，在她的朋友圈子里，吃喝玩乐、“不关心时事”同学还是占大多数，如此一来，安琪说，自己对话的对象就多了。

安琪问同学，对于条例的看法，对于运动者的看法，对于警方、对于政府的看法，安琪得到的答案，不时使得她失望。在她看来，一些同学不习惯批判的思考方式：传媒报道著示威者打人的画面，他们也就真的相信示威者打人，没有求探打人画面的来龙去脉。有时她也看见身边同学的“自我蒙蔽”，所有社交媒体或媒体都在铺天盖地说著这场运动，他们却选择闭起眼睛，活在小确幸的吃喝玩乐里，草草把事情诠释为“打人就是错的，所以反送中都是错的”。

“改变一个人很难，特别是沿自于家庭的一种思维方式，我好像实在没有办法撼动，却又不想看见他们如此被蒙蔽。”安琪说，“我看见背后更大的框架是家庭。”

安琪觉得，她和同学们接受著一样的学校教育，但对于时局有著不一样的关心程度，那背后更大的原因来自于家庭。有些同学的家庭怕“乱”，同学也顺从，从整场运动里抽身保持了距离。如果安琪要让同学们面对这场运动，等于挑战他们对家庭价值的顺从，所以安琪认为，很难，改变很难。

改变以前必先有撕裂，五年前的雨伞运动，至今在人心埋下两种两极化的伏线，一是警民之间，一是家庭价值观。如今，警民裂痕每周末撕得更裂，人们很明显从交战的画面察觉到，倒是家庭价值这道裂痕那么隐藏，并且私人得难以启齿。有些家庭在五年前曾经有过的争执——有无外国势力煽动、有无收钱破坏稳定之类的话，在这个夏天又重新上演了。有些子女因此在运动期间暂时搬家。

故事又回到白灵，雨伞运动的时候，白灵才12岁，读小六，做建筑的爸爸告诉她，金钟很乱。这场运动之初，爸爸也同样告诉她，很乱，要保障自己安全。她有些同学想要出门游

行，却被父母禁锢在家里，确确实实地被反锁在房里，有的同学要撒谎、换衣服偷偷出门来参与运动。



白灵。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们的时代意义

白灵起初到示威集会拾垃圾，回家总要和爸爸大吵一架，说她被人洗脑了，直到警民的冲突愈来愈暴烈了，爸爸向工友了解一切后，才明白这是香港面对的大时代。

他回家告诉女儿，“你才16岁，留一条命，不要为了一条条例牺牲自己，不做前线就好。”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很难说有多少人认真想过要把性命交付，但他们很清楚，这场运动是在争取属于他们的未来，“司法独立、三权分立，这是香港的核心，是我们未来的核心。”安琪说，所以必须有所行动，即使是温柔地。

经过这两个月半的拉扯，面对著政府的冷漠、社会的撕裂，以及一场将来临的大拘捕，有人携著写好的遗书站到前线去了，学生们对自己的生命价值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

“谁和我一起跳，一个小时跳一个，要林郑出来对话！”朗曾经在Instagram里说过这样的话。

他最后没有跳，也没有人响应他的呼召，他消失了半个下午，身边人都在担心著他安危，他才出现说有朋友被捕了，觉得无力，也觉得内疚，“我坐在家里，收到电话，说谁谁谁又被抓了，我真的很不开心，为什么那个不是我？”这无力这内疚正在他们这群运动者里传递开，这个暑假碰面的话题常常离不开死、自杀、不安。

很难想像一场巨大的运动，在这些年轻的生命里，正在埋下什么集体创伤。社会学家Karl Mannheim的看法是，17岁至25岁的青年还在形塑的过程，社会大事成为他们的成长经历时，将影响他们未来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白灵、安琪、朗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说著在这场运动里成长，话里除了强调“香港人”这种身份以外，参与运动也让他们思考自身意志，提高道德要求，比如说，面对暴力的自我克制、是非对错的判断、对权力结构不公的觉察。

日本在六十年代有过一场新左运动，《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书里写那时候运动的参与者存在著“自我变革”的思想，反省著生活里谁支配谁的体制现象，在日常性的政治里改变并

且解放自己。这场运动后来因著警方的暴力而走向武装化，失去了民意，虽然衰退，却也成为日本公民社会重要的遗产。而在那之前，运动最美丽的创造时期，人人也寻找著自己能全力奉献的角色，要求“忠于自我，并且正直地活著”。

几周后，这个漫长的暑假就快消散，开学即将来临。学生们开始期待著，策划著开学以后的罢课、在学校里成立关注组，去信教育局等行动，有游行就继续游行，摆街站、叫口号，想著一切可以做的事情，让运动持续。

他们也不仅著眼于运动，而是开始想像著未来，读完书要去拍电影、要做记者，要当一个改变思想的人，就是不当警察，也不当官员这种磨心角色。

“我们的16岁，本该是最无忧无虑的年纪，本该想著学习、运动，现在我们想著抗争、想著上街。很累很累，但很多人还在坚持。”白灵说。无论结局如何，一些生命也将不一样了。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白灵、安琪、阿朗均为化名。

注一：李立峰、邓键一、袁玮熙、郑炜，《“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2019年8月。

逃犯条例



热门头条

1. 八五香港罢工：交通瘫痪，七区集会，多个警署被围，荃湾、北角再现白衣人
2. 早报：中国央视报导香港女子右眼受伤，引用假照片，“新闻”信源无可稽考
3. “你是香港人来买滤毒罐？”台湾防毒面具相关产品销量上升
4. P2P围城：爆雷后，南京一群基层公务员破产了
5. 即时报道：机场集会大混乱 警察被围后拔枪 《环时》记者及疑似内地辅警被示威者踢打...
6. 周保松：805记者会，林郑的新论述
7. 纪羽舟：齐上齐落之前，负责任地检讨813机场“事变”
8. 0803九龙游行全纪录：尖沙咀到太子处处可见示威者，黄大仙意外爆发激烈冲突
9. 国际媒体如何报道香港街头抗议运动？
10. 港警强力清场致血腥场面：胡椒球枪扫射示威者，港铁内发射催泪弹，女示威者右眼中布...

编辑推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40年（二）：革命之子，城市化与“两面人”
2. 留给我们种子的人：台湾植物园的植物学家们
3. 邓键一、袁玮熙：参与一场不怀期望的社会运动，人们心里在想什么？
4. 媒体观察：机场风波后的24小时，陆港舆论走向哪里？
5. 受威胁的台湾植物谁来保存？走访台北植物园的真实身份
6. 张千帆：专制之下，为何仍需尊重宪法？——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回答
7. 揭仲：解放军进香港“维稳治乱”的设想和代价
8. 即时报道：机场集会大混乱 警察被围后拔枪 《环时》记者及疑似内地辅警被示威者踢打...

9. 纪羽舟：齐上齐落之前，负责任地检讨813机场“事变”

10. 冯嘉诚：反日与嫌韩，日韩贸易战为何停不下来？

延伸阅读

大陆媒体如何报道香港反修例运动？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消解掉意义感、砸烂光环。就算信息传进来，也要国人相信这件事是假的，是没有道德和价值光环的。”

武力失控、恶性循环、投诉无门、中央支持：香港警队正失去制衡？

“不排除当警队越来越政治化，越来越有政治角色时，警队高层会更多思考自己在整个国家和香港的政治位置。”

媒体观察：机场风波后的24小时，陆港舆论走向哪里？

一些中间派或原本支持反修例的大陆网民发声谴责；有人对香港人说：“虽然有理也很委屈，但暴力违法的事千万别做，别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不是苛责你，我是想保护你。’”

邓键一、袁玮熙：参与一场不怀期望的社会运动，人们心里在想什么？

数据说话